

序 言

我是带着欣慰的心情读完《战术魔方》书稿的。掩卷之后，作为从事多年初级陆军指挥学院教学领导工作的老同志，我对从事军事理论及战术研究工作，并以辛勤的笔耕，去培育学术成果的几位作者表示祝贺。由于与这些同志共事多年，我了解他们在倾心于我军初级指挥人才培养工作的同时，以对我军建设事业高度负责的使命感，潜心钻研军事理论研究工作所付出的代价，深知这些同志为丰富和发展我军战术学研究而不懈努力的良苦用心。鉴于此，我欣然接受为《战术魔方》写序之邀。

战术学作为研究战斗这一战争现象的军事学科，可以称之为军事指挥艺术的基础，是军队指挥理论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环。离开了战术这块“基石”，战役和战略“大厦”的构建就无从谈起，因为“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它服务的”，“只有重大的战术成果才能导致重大的战略成果”（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删节本第77页，第78页）。战术，执作战指挥之“牛耳”，对作战行动的胜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无一例外地青睐于“术”的研究及实践。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战争行动的大背景涂上了充满新意的重彩，未来作战对战术行动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人们不能不思考：如何在扬弃的思想指导下，使战术研究在继承传统战术精华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既不固步自封，沿袭历史，又不妄自菲薄，轻视和放弃传统战术的精思妙法。这就需要在历史与现实、思维与实践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战术的发展更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我想，《战术魔方》的作者们也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而命笔的。

战术学是一门科学的理论体系，但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理论不能原封不动地迁移于战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有把握了

用谋施变这一战术指挥艺术的关键,才能使战术理论成为战火硝烟中的一朵奇葩,灿然开放。《战术魔方》一书,通篇贯通着谋变的思想,并通过大量引证,辅以哲理性较强的评析、释理,并注重运用战术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立足于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战术指挥和行动的特点和规律,力求回答战术学基本理论无法详细阐述的相关问题,且语言风格清新,娓娓道来,易于接受。不难看出,作者们的确动了一番脑筋,并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

《战术魔方》作为战术学理论研究的辅助性读物,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本有一定价值的参考书。基于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认识的有限性,又由于作者们对战术学研究的局限性,《战术魔方》的编著尚称不上完美,但如果把这本书比做开启战术指挥思维之门的钥匙,似乎也不为过。

应当看到,战争行动扑朔迷离,战术指挥领域又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领域,新思想、新武器的发展运用,都将首先引起战术领域的变革。“谋无定规”,“战无定法”,因时因地因形施“术”,才可能在战争的舞台上有所作为。

愿广大指战员和军事爱好者们与本书的作者们一道,为战术学研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95年8月

写在前面

谨以《战术魔方》献给致力于战术学研究的同仁。

(一)

魔方，是“魔术立方体”的简称，亦称“埃尔诺立方体”，是匈牙利建筑师埃尔诺于1974年发明的一种玩具。魔方的显著特征是其无穷的变化性，有人计算过，一个魔方能变化出432520032744亿种不同颜色的组合形式。

战术与魔方原本风马牛不相及，我们之所以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旨在借用魔方多变的组合方式来比喻战术变化的异彩纷呈。

变化，是世间一切物质的共有属性；

谋变，是战术思想、指挥和行动的灵魂。

(二)

战术，作为指导和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是军事斗争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战术，又包容着战斗部署、协同动作、战斗指挥、战斗行动、战斗保障、后勤和技术保障等诸多方面。然而，抛开战术本身的一般表现形态，又怎样理解战术的核心和要旨呢？我们说，战术的核心在于灵活机动，战术的要旨在于谋变制胜。

不言而喻，战术是作战指挥领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军事斗争方式的变革而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课题。正如朱德元帅所说：“战术对你们万分需要，是你们的‘补药’。你们的作战经验很多，但就像一大篓子钱，是散的，战术就是钱串子，可以把那些钱都穿起来，用的时候，要用哪个，就拿

哪个。”(《朱德选集》第222—223页)这通俗的比喻向我们揭示的是:作为军事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战术,蕴含着作战指导的基本规律,牵动着所有的军事行动。

(三)

自从战争问世之后,战术就同时孕育于战场。从古代布兵列阵的直面格斗,到近代线式和散兵战术的形成;从平面战术的抗衡,到立体战术的拼搏;从单一兵种战术的运用,到合同战术体系的构建,战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战术发展史,自始至终贯穿的都是“谋变”二字。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兵学思想源远流长的东方之国,史册上记载的无数以弱胜强的战例,从战术的意义上掘其秘诀要旨,无不都是睿智用法、谋变制胜的。正源于此,战术指挥才得“军事艺术”之誉。

面对世纪之交,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大量高新武器装备投入局部战争的战场,高技术战争的模式已脱胎而出,几年前的海湾战争已做出了印证。而这一切都对战术的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由此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在高技术战争中,墨守成规就意味着失败。战术必须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在变化中孕育更加高新的战术。

我们所面临的是严峻的挑战。

(四)

历史昭示人们,两军厮杀的战场,静态总是相对的,而动态则是绝对的。纵览古今中外战史,高明的指挥员,无不善于因势用术,由奇出谋,以变制胜。《战术魔方》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战术学基本理论与应用为载体,立足于现代战场,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着重探讨与战术行动相关的取胜对策。全书以“谋”、“变”为主线贯穿,以古今中外特别是现代高技术战争实例为典型,力求覆盖

战术范围的各个侧面,力争在战术理论与战斗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之成为提高我军分队指挥员战术思想、决策及指挥水平的“益友”,以便突破传统战术观念,适应部队现代化建设及战法研究的需要,促进我军战术训练水平的提高。

(五)

在《战术魔方》的编著过程中,我们始终把握的原则是,避开纯理论性的表述,而使其成为对战术学研究具有解析性的辅助读物,做到源于基本理论,活于基本理论。如果广大读者能从本书中悟出(不是读出)战术变化的奥理,而不仅仅是学会一两招战术变化的模式,就达到了我们的写作目的。鉴于这一点,本书在写作风格上力求语言简练生动,通俗易懂。做到以思想性、启发性、知识性为主,兼顾趣味性、可读性和实用性。本书在体例上分为战术思想篇、战术谋略篇、战术运筹篇、战术条件篇、战术运用篇、战术保障篇六个模块,尽量使其与战术基本理论的体系相对应,以便研读。

虽然我们在撰写此书时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对战术学,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术发展研究得还不够,难免会有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5年8月于大连

目 录

第一单元 术与智

- 术出于智..... (1)
- 术胜于智..... (5)
- 大智大术..... (9)
- 术智相生..... (14)

第二单元 术与识

- 术胜于识..... (19)
- 识博术奇..... (23)
- 术识相辅..... (26)

第三单元 术与气

- 术胜于气..... (29)
- 因气用术..... (32)
- 用术夺气..... (36)
- 治气有术..... (39)

第四单元 术与断

- 断生于术..... (44)
- 断准术强..... (48)
- 断变术移..... (51)
- 断高术新..... (54)

第五单元 术与诈

- 诈寓于术..... (59)
- 因术施诈..... (63)
- 辨诈用术..... (67)
- 术变诈更..... (70)

第六单元 术与奇

- 术本奇正 (75)
术奇制胜 (78)
术奇不复 (82)
术奇在新 (85)

第七单元 术与争

- 争权析术 (91)
争机营术 (97)
争胜凭术 (103)
争全以术 (105)

第八单元 术与数

- 数中有术 (112)
术中有数 (117)
术数相生 (122)
战以计首 (126)

第九单元 术与形

- 术寓于形 (131)
形寓于术 (136)
术形相悖 (140)
无形之术 (145)

第十单元 术与势

- 因术造势 (149)
因势制术 (154)
术势相辅 (158)
势变术异 (161)
术势在人 (165)

第十一单元 术与天

- 因天制术 (169)
天变术更 (172)

术天反常·····	(176)
术胜于天·····	(179)
第十二单元 术与地	
因地施术·····	(183)
策术瞰地·····	(187)
争地用术·····	(190)
第十三单元 术与技	
术出于技·····	(196)
术也定技·····	(202)
术更有期·····	(205)
技精术更·····	(210)
第十四单元 术与速	
术施贵速·····	(215)
识术尚速·····	(219)
术变崇速·····	(222)
术胜于速·····	(226)
第十五单元 术与力	
术恃于力·····	(231)
术贯力优·····	(235)
因力制术·····	(238)
力变术异·····	(242)
第十六单元 术与管	
术寓于管·····	(249)
术成于管·····	(250)
管中有术·····	(254)
术管相融·····	(258)
后记 ·····	(263)

第一单元 术与智

何谓术？《韩非子·定法》中曾有过阐述：“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如果通俗地说，术，就是手段和策略。从作战的角度而言，也就是被称为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的战术。在军队生死决斗的战场上，兵家所以“胜于易胜”，则无不与其善术有关。善术，作为兵家所追求的谋胜境界，又是其睿智的必然结果。

术有万端，皆智而生。作战中举凡因术而胜，则多胜于智。正如军事家所言，智高者术奇。军队制胜，全在于指挥员智力的不凡。

战争的实践辩证地告诉我们，术与智，通常相约相生，大智者，则大术；善术者，则必定智强。而用兵无术，多属于无智。克劳塞维茨曾说过，平庸的智力碰巧也能辨明真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就平均结果来看，智力不足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虽然通常表现在因术动止，用术制敌的速度和质量上，但实质上反映的却是双方指挥员智力竞争的水平。术与智的契合，才使军队的作战行动犹如变幻莫测的“魔方”。而这种“魔方”，只有在 大智奇术指挥员的操持下，才能组合成千变万化，奇异绝妙的胜利“图案”。

术出于智

智，泛指智慧和智谋。《孙子兵法·计篇》中关于“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论述，也首先把“智”作为衡量将帅素质的首要标准。

古代兵家伐谋用兵，尤其强调的就是“智”。《司马法》中的“凡战，智也”、“战以智决”；《六韬·文韬·上贤》中的“无智略权谋而

重赏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谨勿使为将”等，都是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智”的重要性。

战争，不仅是勇力的较量，也是智力和智慧的竞争。《孙子兵法》中讲的“兵者，诡道也”，指的就是在战争中运用奇正、分合、虚实等手段，通过欺诈敌人，战而胜之。但就其实质而言，诡道之法，就是斗智，以智谋取胜。

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曹操率四万之众，击败袁绍十万军队，所表现出的就是曹操卓越的军事智力水平。当时袁绍为达到“南下以争天下”的目的，选精兵十万攻打曹操。曹操认真地分析了形势，采取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连用三计大败袁绍。

第一计，声东击西，解白马之围。曹操的白马太守刘延正面迎敌，陷入重围。曹操佯以渡河，攻击袁军后方，遂引兵向延津西进，袁绍“即分兵西迎”。曹操乘机率轻骑，急趋白马，斩杀敌将颜良，袁军溃败，白马之围遂解。

第二计，南撤引敌，伏击文丑。白马解围后，曹操循延津之水向官渡方向撤退，袁绍率部渡河尾追。追至延津时，曹操令军队隐伏于南阪坡下，并故意将白马之战所获的袁军辎重散遗道上，以此麻痹袁军。袁军前锋文丑大将率五六千轻骑赶至后，士卒见物资丢弃满地，竞相争抢，阵容大乱，曹操抓住战机，指挥不足六百骑，出击袁军，文丑因节制失灵，被斩杀于乱军之中，袁军再遭重创。

第三计，夜袭鸟巢，断敌生路。曹操伏击文丑后，撤回官渡，袁绍又率主力进逼，其东西立营约数十里。曹操分营与之对峙三月后，得知袁军在故市、鸟巢的屯军无戒备，便亲率精骑五千，赶至鸟巢纵火，致使守军大乱，曹操趁乱冲杀，守军溃败。袁绍以为此时曹营空虚，便乘势进攻官渡，久攻不克，其大将张郃、高览见大势已去，投降曹操。袁军军心骚动，四处奔逃。袁绍则率八百骑，仓皇渡河北窜。

官渡之战，从形式上看是曹操以主动性、灵活性、速决性等战略战术以弱胜强。然而，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兵家的战胜之术，

主要来源其非凡的智力，正所谓术出于智而智决于术。

在军事领域探索的人，常以“魔”来形容战术的变幻莫测。实质上，这种“魔”的内涵，就在于神奇。神奇的思维、神奇的战法，皆是与众不同的智力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认识，智力应该是克敌制胜的最关键的要素。无智，则无术，这是被战争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

在战争中，作战双方的伐谋，实际上就是在伐智。所以，在两军拚搏厮杀前，双方谋胜的基本较量就是斗智。而通过不同的智力所制定的战略战术，往往在交战前就能洞察出胜负的端倪。因此，衡量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谋略能力，应该首先看其智力水平的高低。

从战争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出发，军事指挥员之“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诡道谋胜，诡道，反映了军事斗争的根本特点，也反映了军事指挥员智力的深厚程度。而以诡道谋胜，则是其智力进入的最高境界。《孙子兵法》中提出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等诡道十二法，其要旨则在于“先计而后战”，先斗智后制胜。

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臆，指挥齐军在桂陵、马陵两次大破魏军，就是善于运用诡道之术的范例。在桂陵之战中，孙臆一再对魏军“示之疑”、“示之不识事”。他选择了“不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夫，进击难攻的平陵城，使其“当术而大败”；又“遣轻骑东西驰梁郊”，使敌感到震怒；再分以少量兵力跟其后，对敌“示之寡”。运用一系列诡道之术后，魏将庞涓“果弃其辎重，并趣舍而至”。孙臆设伏“击之桂陵而擒庞涓”。而在马陵之战中，孙臆施用“减灶”之术击败庞涓的战例，更是“能而示之不能”，诡道制胜的典范。可见，兵家行诡道之术而屡胜，是其决策思维摆脱常规常法，而善于“曲线运动”的结果。说到底，还是其智力优势的充分施展。

战场上，将帅伐谋用势而胜负不同，也主要表现在智力上的差异。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之谋，作为历史上用兵之绝唱，是齐国军师

孙臧的主张，而身为大将的田忌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两者比较，智力上孰优孰劣，便昭然若揭。所以，诡道谋胜，智是基础。乏智而诡，只能在常规常法中偶然得胜。大智而诡，才是“能机权，知通变”用谋难虞，战胜不复的高手。

二是善于创造。军事指挥员能够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可以说，都是其创造性用兵的结果。而每次成功的创造，应该说都是其卓越的军事才智的具体反映。“兵诡于术，而奇于创造”，在诸多以创新之术赢胜的战例中，都能从中找到兵家大智而施的痕迹，故古人才有“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的感受。

人们比较熟悉的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因时因地创造的“鸳鸯阵”曾使倭寇闻风丧胆。作为“用兵作战不负于法，合时措之宜”的谋胜高手，其智力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英国近代著名海军将领纳尔逊，在1805年的英法特拉法加海战中，改革当时海战中双方战舰排成一字横列，互相用一侧船舷炮射击的战术，采取了纵列勇插，机动作战的新战术。他把全部舰队分成两队，其中一队插入敌舰队的中央和前卫之间，攻击敌人横队的中央，从中间突破，割裂敌舰队。纳尔逊按计划亲自率领三艘战舰，突入敌方横队包围了敌旗舰，迅速瘫痪了敌指挥中心，使法军33艘战舰被俘，20艘战舰受损，而英舰未损失一艘。纳尔逊的胜利，是善于创造和运用新战法的结果。但如果从深层次上认识，还是其智力高敌一筹。

在军事斗争中，智力是创造性运用战略战术重要基础。在中华民族战争史上，孙子、孙臧、曹操、诸葛亮、戚继光、毛泽东、刘伯承等著名将帅，无一不是智力超群的人。可以说，他们创造的种种神奇莫测的用兵之术，皆源于其智力。非凡的智力，诱发了他们强烈的创新意识；非凡的智力，才使他们在波谲云诡的战场上，每每都能出奇制胜。也难怪兵家彻悟出“凡战，智也”的道理。

克劳塞维茨曾说过：“不具备卓越智力的人，在军事行动中是不可能取得卓越成就的。”在战争史上那灿若星河的战例中，人们

往往较多地崇拜将帅用兵有方和制胜有术的素质，却很少从他们非凡的智力中，去揭示其制胜的奥妙。客观地认识战争，应该说军队的任何一次较量，都是由军事指导者智力的高低来决定胜负的。可以认为，军事指挥员所有的奇谋妙术，都是其智力的升华。因此，军队的战斗力之差，归根结底还是军事指挥员的智力之差。公元208年，曹操统一北方后，亲率大军南下攻打荆州，刘琮不战而降。刘备新败长坂，无力反击，只好撤退。江东张昭之流，为曹军气势所摄，极力主降。而诸葛亮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对孙权说，曹操军远道南下，几战后已成强弩之末，且北方人不习水战，荆州水军降曹，是迫于无奈，非真心助曹。如此时东吴派猛将统兵数万与刘备协力作战，曹操必败无疑。正是由于诸葛亮以其非凡的智力，在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战争表象中，洞察本质，抓住关键，做出正确的判断，联合刘备抗曹，才获得了赤壁之战的大胜。

术出于智而胜于智。军队在战场上进行谋略对抗，衡量作战双方胜负的一个显著客观标准，就是双方指挥员智力的高低。战争的实践也反复证明，一支骁勇善战，克敌制胜的军队，其指挥员也必定是智力卓越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军队的战场之胜，实质上就是智力之胜。

术胜于智

1947年冬，邓小平率部队抵黄河北岸。为迅速歼灭据守黄河南岸之敌，邓小平采取了“示假隐真”之计，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某日夜，据守黄河南岸之敌，借助探照灯发现北岸水面黑压压的一片头戴钢盔的“士兵”游来。敌师长遂命令部队“等共军渡河部队进入火炮射程内再射击，将共军全部消灭在黄河里”。当“渡河部队”渐逼南岸时，敌枪炮齐发，甚是猛烈。顿时，河面上鲜血飞溅，染红了大片河水。正当敌得意之际，其后方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

声。原来，我主力早已趁夜色从上游乘船和木排渡过黄河。敌背后受击，未及抵抗很快就被我全歼。此次作战，敌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渡河的“士兵”原来是钢盔下边绑着的干葫芦。这些葫芦上系着猪尿泡，里面装满了红颜色的水，还拖着一些猪肠子。

如此精心的欺骗，让敌产生错觉就不足为怪了。而这一绝妙的以假乱真行动，不仅反映了邓小平用兵谋略的高超，而且生动地体现了其优于敌的智力。

由智施术，出奇制胜，由事物的客观规律，发现其中的必然规律，而不拘常法，料敌谋势，灵活用兵，是指挥员指挥艺术的显著特征。从战争的实践看，大凡胜战，往往多是胜智。因此，术胜于智，则成为战争指导的普遍规律。

《何博士备论·苻坚论》中说：“兵以义军，而以智克”。在军事斗争中，军事指挥员伐谋赢胜，说其善用术，不如说其善用智。

认真研究古今中外诸多著名战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战例几乎无一不是以指挥员卓越的智力为致胜的关键因素。相反，许多失败的战例，也多与指挥员乏智或低智有关。

术胜于智，需要因敌用智。以智胜敌，要针对不同的作战对象，灵活地运用战术手段，这样才能达到“胜于易胜”的作战目的。被史学家称之为“军无幸胜”的曹操，在战争中注重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敌情，充分施展其智力，故每每都能战胜敌人。建安十六年（211年）正月，张鲁占领了汉中。当曹操准备对张鲁采取行动时，马超、韩遂却联合了李堪、成宜、杨秋、梁兴等，组织了十支割据武装一起叛乱，并开进潼关一带。曹仁主张对叛乱武装硬攻，曹操却认为，“关西兵精悍”，硬攻必吃亏。遂下令“坚壁勿与战”。七月，曹操率领大军西征。开始，他用“疑兵”之计，把正面摆在潼关，暗中派一支人马西渡黄河，抢占河西要地。接着，又在渭南设伏兵，把半夜前来劫营的马超杀得大败。九月，曹操大军渡过渭水，马超、韩遂见势对己不利，提出割地求和。曹操又采取了“痹敌”之计，表示“同意”，还约定双方在阵前单骑会面。当曹操单骑出阵时，他又使出

“间敌”之计，向对方的韩遂故作姿态，欣喜叙旧，欢谈了很久，只字不提战事。韩遂回营后，曹操还亲笔给他写信说：“你参加起兵，是他人逼的……，希望你早日投诚过来。”这样，马超对韩遂便起了疑心。当叛军内部互相猜疑，联合趋于瓦解时，曹操便集中兵力，一举歼灭其主力，斩成宜、李堪，韩遂和马超、杨秋和梁兴分别逃往凉州、安定，关中遂平。

曹操施以“疑敌”、“痹敌”、“间敌”三计，即达到平息叛乱之目的，是因敌用智的必然。当初他把主力摆在潼关，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目的在于“疑敌”。尔后又过黄河、占要地、渡渭水，进而赢得了平叛胜利的基础。其后曹操又与敌单骑会面以“痹敌”，叙旧欢谈以“间敌”，多种手段并用，不断瓦解敌人，减弱敌人的战斗力，最终轻而易举地平定了叛乱。此三计并施，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确实表现出了非凡的智力。可见，在军事斗争中，指挥员善于用智非常重要。善用，才能最大限度地以己之智，克敌之智，从而由智胜于敌，达到力胜于敌的目的。

术胜于智，也需要料势睿智。以智施术，关键在于睿智而远谋，善于从战场上复杂情况的表象中，谋划出作战全局中克敌制胜的诸多招法。正如兵家所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置身于战场上的大智者，在进行军事决策时，往往都能从作战的全局和作战发展变化的趋势中，发现和把握致胜的契机，进而牢牢地操持战场上的主动权。

我军历史上，曾被毛泽东誉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之战，就足能说明这一问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北上，预定在四川泸州上游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遭到国民党川军南下堵截，便一渡赤水河，准备改由宜宾上游再渡长江。国民党川军察觉了红军的企图后，一面在长江西岸严密布防，一面以重兵衔尾紧追，妄图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和滇、黔军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在川滇黔边区机动作战，创造新根据地，遂进至云南扎西集结。此时，各路敌军逼近，企图围歼红军于扎

西。危急之中，毛泽东同志决定率红军向东、二渡赤水，回师遵义，袭击弱敌黔军。红军渡过赤水后，连克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遵义之战后，敌采取堡垒战术，步步为营，企图长期围困红军，陷红军于绝境。毛泽东又指挥红军寻路北上，向云南进军。针对敌怕红军北上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心理，指挥红军三渡赤水，并佯装再次北渡长江，吸引敌人于西北。敌果然中计，向西北急进，又企图围歼我军于长江南岸地区。此时红军又迅速回师四渡赤水河，调动和摆脱了敌人，为胜利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北创造了条件。

整个四渡赤水，前后呼应，一气呵成。毛泽东同志以其大智大勇，运用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出色的成功的机动”，忽而大踏步前进，忽而大踏步后退，声东击西，或南或北，矫若游龙，动势自如，从而处处胜券在握，操持主动。

四渡赤水之战，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智者风度，其中最为可贵的是，他能够从作战的全局着眼，针对战场的具体情况与敌斗智，灵活地运用战术，在广泛调动敌人的过程中，抓住战机，积极地打击敌人，进而化患为利，屡屡主动。可见，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主要源于指挥员的智力的高低。敌我双方在战场上的较量，形式上是军事实力的角逐，而实质上却是智力的抗争。因此，在实施作战决策时，只有在智力上占优势，才能在战术上高敌一筹，确有把握制敌赢胜。

术胜于智，还需要择情施智。战场上，指挥员以智谋术，主动创造战机，灵活地打击敌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善于择情而施。即通过准确地分析和判断战场上的具体情况，以符合客观实际之智，谋划出“致人而不致于人”之术。如果用智而不适情，运筹而不合势，则容易陷入盲目决策，被动受制的困境。从作战的实践看，凡是大智者，一般都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其术往往都能出敌意料，而稳操胜券。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某师向三所里实施战役穿插，